

评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严 清 华

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负有盛名,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学术界有些同志曾予以很高的评价,说他“梦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①,“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接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的重农主义体系”^②。这些同志对龚自珍经济思想的评价,看来与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享有的较高评价有关。而事实上对于他的经济思想的评价,则是不能简单地用前者来加以代替的。因而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指导原理,对龚自珍的经济思想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龚自珍对清末思想界、尤其对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曾起过巨大的开导或启蒙作用,因而学术界不少人一提到他,便往往誉之为“一代新风的开创者”。但据我理解,这一盛誉应该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也就是说并非指他在所有领域或任何方面都是如此。

考察起来,“开新风”一语之用于龚自珍身上,追本溯源,最先出自龚自珍本人之口。1839年他在被迫辞官南归途中,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③这诗中的“开风气”一语原是他用于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抱负的。后来,经过一些同辈学者和以后进步思想家们的逐步渲染,尤其经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的充分肯定,龚自珍开新风一说遂为尔后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无论与龚自珍同辈的学者们,还是后来的梁启超等人,他们之肯定龚自珍,似乎就大都有所特指的。如龚自珍的生前好友张维屏曾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自珍)开之。”^④张维屏是与龚自珍同时代的诗人,他肯定和赞扬龚自珍似乎就与其侧重于从诗文气质或学术风格上考虑问题有关。又如梁启超曾说过:“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⑤。他这里所指的主要是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⑥的举动,是其对于“晚清思想之解放”^⑦的功绩,或其作为“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⑧的作用。即指其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于包括梁启超自己在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和思想家所发生的积极影响。总之,他们都是从政治思想和诗文气质、学术风格等方面着眼,来肯定龚自珍的开新风作用的。梁启超等人对龚自珍及其思想的这种理解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龚自珍在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

龚自珍生活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没落、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之途的历史时期。当时,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经济衰落,孕育于封建社会母体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日益猖獗,封建经济的相对稳固局面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⑨。当时社会经济的严重局面,集中反映在清朝统治的政治危机上。其突出表现就是白莲教等农民起义的频频发生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整个封建统治的政治大厦都因此而处于不断摇晃、濒临崩溃的境况之中。龚自

珍正是生活在这座摇摇欲坠的政治大厦里面。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的家庭，曾在清朝中央机关中作过多年的小官。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使他有接触和了解到当时朝廷的黑暗内幕，窥见到整个清朝统治的危机局面。他曾尖刻地嘲讽和鞭挞过封建帝王“一人为刚，万夫为柔”^⑩的专制淫威，揭露和批判过官僚吏胥凌法妄为、贪污中饱的无耻行为。在他笔下，当时的社会已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⑪，是大难将临的“衰世”^⑫。作为一位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为此而深感惆怅、悲愤与忧虑。于是他发出了“奈之何不思更法”^⑬的浩叹，提出了“更法”、“改革”^⑭的要求与主张。他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从而也就实际上在政治思想方面起到了开拓一代新风的作用。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关心社会问题，提倡经世致用，为当时学者解放思想开了先河；加以其诗文清奇卓异、震荡人心，因而也就使得他在学术研究和诗文方面备受当时学者和进步思想家们的赞赏和钦羨。

总之，无论从前人对龚自珍的评价来看，还是从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龚自珍作为对清末思想界起过巨大启蒙作用的思想家的意义，均主要在于其政治思想、学术风格和诗文气质等方面。

一般地说，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与其经济思想决不可能毫无关系，龚自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不可能对其经济思想毫无影响。但是，他长期任官于京师，尽管他对当时朝廷的黑暗内幕有所窥测，但对社会经济的实际问题却鲜有接触，因而其经济思想便缺乏坚实的实践基础。他“好今义”^⑮，喜欢用所谓“微言大义”来论述社会经济问题，这种学术嗜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经济思想的展开。因此，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所获得的较高评价来代替对其经济思想的评价，而必须对其经济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否则便无以明其旨而达其意，评价也很难做到正确、公允。

二

无可否认，与前述龚自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思想的内容紧密相联，龚自珍经济思想中确实有一部分带有浓厚批判性色彩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其客观作用或历史意义而论，并不一定比他的政治思想显得逊色多少。因此，对于这部分内容，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予以以一定程度的肯定亦未尝不可。

龚自珍的这部分经济思想，主要表现何在呢？

首先，他对当时惨重的民生凋敝现象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过尖刻辛辣的揭露，并在此基础上鞭挞了当时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行为。他指出：“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于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⑯就是说，封建经济已日益衰落，社会寄生虫却空前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生计窘迫，已呈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在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上层统治者非但没有采取积极有力的解救措施，却反而继续在那里采用“开捐例、加赋、加盐价”^⑰等办法加强对老百姓的搜括，贪官污吏仍在那里搞层层中饱，结果造成“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⑱的严重局面。对此，他深表愤慨，他讽刺上层统治者对于赋税的苛敛有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⑲，认为官吏中饱、商业兼并是致使当时社会经济发生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他从经济领域对当时社会危机现象的揭露，在当时来说，可谓入木三分，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他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为愚弄人民而鼓吹的所谓“大公无私”说教。他认为，当时的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为自私心理或自私行为所充斥着。他指出：“天有私也”，“地有私也”，“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忠臣”、“孝子”、“寡妻贞妇”无一不“有私也”。在他看来，自私是人的本性，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志之一。他说：“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孰疏孰亲，一视无差”，那才是真正的“无私”。而人则不同，“必有孰薄孰厚之谊，因有过从宴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他反驳统治阶级的虚伪说教道：“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②在这里，他把作为大自然象征的天、地、日、月和体现社会范畴的“私”硬扯到一起，把表现人类文明的某些生活习性和动物界的禽兽交媾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是极不恰当的。但是，他实际上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群众的所谓“大公无私”说教，这却值得历史地加以肯定。

再次，他在阐述自己的财富观点时，批判了统治阶级所宣扬的“耻言富”说教。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无耻言富之事”。他列举典籍文献说：“《洪范》五福，二曰富；《周礼》八枋，一日富”。他列举历史事实说：“天子富有四海”，诸侯“有巨万之资”，“周公未尝不富”。他不同意孟子关于“士”能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的说法。他指出，这些人与“得财则勤于服役，失财则怫然愠”的“厮仆”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人情皆愿娱乐其亲，贍其室家”。倘若他们“廉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便不能“忘家”、“忘私”。因此，他主张应使士大夫和各级统治者都富裕起来，使之“不必自顾其身与家”，“泰然而无忧”。他认为只有这样，这些人才会“以其余智筹及国之法度，民之疾苦”^③，封建统治才会长治久安。

对于他的上述思想，我们首先必须看到它所体现的阶级实质。他揭露当时社会经济的严重问题，目的是为了引起封建统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批判统治阶级宣扬的“大公无私”和“耻言富”说教，出发点也无非为了论证剥削阶级追求私利和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归根到底，他考虑问题的立场仍然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这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本质。因此，他经济思想中的这部分内容，就其思想性质而论是不值得加以肯定的。同时，从理论上讲，他的这部分思想与在他之前的进步思想家的类似思想相比，也未见其提供多少新的东西。对现实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他以前所有主张改革现实的思想家大都具有的特征之一。至于不讳言“私”和“富”，也是许多古代进步思想家所抱有的态度。根据列宁的教导，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主要看他是否“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④。龚自珍的上述带有批判性色彩的经济思想，很难说在理论上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因而也就很难有何理论贡献可言了。

但是，他的这部分思想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发生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领域揭露当时社会的严重危机现象，从意识形态领域抨击统治阶级的所谓“大公无私”和“耻言富”说教，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客观上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而他的这部分思想尽管没有什么理论贡献可言，但却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意义。列宁曾提醒我们：“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⑤错误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何况龚自珍的上述思想不一定全都错误呢！所以对于他的这部分思想的历史意义，我们决不可予以忽视。

而且，还应看到，他的这部分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们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他以后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这种思想的影响，只是其影响不及其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思想那样明显与突出而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龚自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决定

了他的经济思想的成就的限度，从而其作用和影响的范围与程度。所以即令对于他的这部分应当予以肯定的经济思想，我们也应加以具体分析，决不可笼而统之地予以过高的评价。

三

龚自珍经济思想的更多内容还体现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中。这部分内容，无论就其思想性质和理论意义而论，还是就其历史作用而论，都不可与其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思想的内容同日而语，也不可与其带有浓厚批判性色彩的那部分经济思想等量齐观。因而对于这部分思想，倘若作过高的评价，则更是大为不妥的。

龚自珍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最突出、最重要的有二项。

一是他的“平均”主张。这一主张是他在农民起义的深刻影响之下，作为考察和分析当时社会危机根源的结论而提出来的。其目的也无非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他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贫富不均，由于贫富的不断分化，因而“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把贫富之间的差别程度看作是决定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根本原因，他说：“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他告诫统治者应“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以便做到财富分配的大体平均，达到维持自己统治的目的。他心目中的所谓“平均”，并不要求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之间的差别，而只希望在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小不相齐”现象不至发展到“大不相齐”的程度。他用形象的比喻描述过自己理想中的夏、商、周三代的财富分配情形：“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他所极力赞赏和主张的就是这种严格按身份地位获取社会财富的等级分配制度。他认为当时对实现这种分配制度起着阻碍或破坏作用的社会力量，不仅有贪污中饱的官吏，而且还有从事商业兼并活动的商人。他说：“肆有魁，贾有梟，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把商人中的“魁”、“梟”、“贤桀”即商贩头目和大商人看作兼并势力的主要代表者。对于这些人，他主张采用抑制和打击的办法，使之“退而役南亩”^④，并进而主张打击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还提出了“四挹四注”的“平均”办法：“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⑤所谓“四挹四注”，实际上讲的是自然力本身以及自然力与人力之间相互调剂的意思。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只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中国自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⑥之后，提倡“平均”主张的思想家可谓不乏其人。比较起来，龚自珍的主张还不如历史上有的类似主张如北魏时的均田主张那样具体、周密而富于实际意义。北魏时的均田主张，尽管其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但它把着眼点放在封建制度的最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并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土地占有关系的需要出发，具体地规定了土地的分配方式，受田的数量和受田、还田的办法等等。北魏基于这一主张而制定的均田制，曾经得到了实行。而且这种制度历经北朝、隋，直至唐中叶才被废除，实行了近三百年之久，足见它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的。这些都为龚自珍的“平均”主张所望尘莫及。至于被压迫农民群众自己提出的采用暴力方式以均分地主土地的口号和纲领，龚自珍的主张更不能与之相比，它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龚自珍的“平均”主张，不仅在思想性质上打上深深的封建主义烙印，因而在当时来说是落后的、反动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甚至不及其前辈在方面的思想，因而也是保守乃至退步的。

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考察，这种保守性、落后性就更加明显了。在当时封建剥削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的情况下，主张以封建等级制度作为人们财产占有关系

的基础,企图用承认“小不相齐”的所谓平均办法来保存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至于通过所谓打击商人和商品货币的办法来解决“大不相齐”的问题,那更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因此,它决无所谓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可言。

龚自珍的另一重要经济改革方案,是他的“农宗”主张。这一主张的基本内容是要在全国农村建立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经济组织,并以之为基础来占有土地和组织生产。根据他的设想,“农宗”组织下的社会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个等级。开始时,一家有地百亩以为家业。以后,长子为大宗,家中原有的百亩之地由其继承;次子为小宗,另分地二十五亩;三子、四子为群宗,也各分地二十五亩;五子以下为闲民,不分土地。大宗之诸子也按上述规定继承和分配土地。小宗之长子仍为小宗,继承二十五亩地;次子为群宗,另分地二十五亩;三子以下为闲民。群宗之长子仍为群宗,继承二十五亩地;次子以下为闲民。闲民之子仍为闲民。闲民不分地,永为佃农,替同宗或别宗耕种土地^②。非常清楚,这一设想基本上是以封建等级关系为前提,以长子财产继承权为基础,以封建宗法组织和小土地分配制度的结合为内容的。它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和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龚自珍的农宗设想,基本上得之于西周宗法制的模式,并非他自己的发明创造。龚自珍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因而他宣称自己“药方只贩古时丹”^③。他的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也针对其有的改革方案,指出“皆古方也”^④。其实,他们都不懂得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也无法在社会改革方面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一客观事实所使然。不过,他们都认为上述改革方案并非什么新鲜货色,这却道出了历史的真情。

宗法制存在于西周时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企图将之推行于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却已完全失去历史的意义。在当时封建经济日益解体、资本主义早已萌芽的条件下,企图用宗法式的血缘关系来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支撑日益崩溃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既是天真的幻想,又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的发展已把打破包括宗法制在内的落后制度作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龚自珍却仍在那里贩卖所谓“古时丹”以求医治清王朝的痼疾,其性质无疑是反动的。

龚自珍提出上述带有幻想特色的、落后乃至反动的经济改革方案,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为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基础尚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改革方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⑤在历史上,龚自珍的上述具体经济改革方案并未付诸实行,因而它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影响。这是不同于他的具有浓厚批判性色彩的那部分经济思想的。

总之,龚自珍经济思想中确实有一部分具有进步性质的内容,其进步性就表现在这部分思想的客观作用或历史意义方面。他经济思想的大部分内容则是落后、保守乃至反动的。从理论上讲,即令其具有进步性质的那部分经济思想也未见其有什么创新之处,更何谈是否接近“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⑥的重农主义体系。从思想性质上看,充其量他只是表示了对于旧制度的怀疑,根本没有象前述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已有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想法。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他的经济思想,我们决不可作过高的评价,决不可简单地套之以学术界对其政治思想和诗文所作的评价。这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其经济思想的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与研究。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⑦。即令从龚自珍经济思想的研究中似乎也可看出,对于这一“活的灵魂”,我们是须臾也离开不得的。

注释:

-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675页。
- ② 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第34页。
- ③⑩⑪⑬⑮⑯⑰ 《龚自珍全集》,第519、20、87、35、521、8、513页。
- ④ 转引自中华书局1959年版《龚自珍全集》出版前言。
- ⑤⑥⑦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 ⑧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⑨⑳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290页。
- ⑫⑭ 同上书,第6页。
- ⑬⑰⑱ 同上书,第106页。
- ㉑ 本段引文均见同上书第92页。
- ㉒ 本段引文均见同上书第29、30页。
- ㉓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 ㉔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2页。
- ㉕ 本段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同上书第78、80页。
- ㉖ 《论语·季氏》。
- ㉗㉘ 参见同上书第49—50、36页。
- 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
- 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

(上接第48页)发展到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更高级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旧的生产关系为另一种更进步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就是历史的唯心论。

尽管马扎尔、秋泽修二、陶希圣等人在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中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共同之处就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把中国社会说成是特殊社会。他们的共同目的就在于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共同的客观规律性。

注释:

- | | |
|-----------------------|----------------------|
|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 ④⑤ 李达:《现代社会学》。 |
| ②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 ⑥⑦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 ③ 米丁:《历史唯物论》。 | ⑧⑨⑩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
| | ⑪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

.....

附记:本文系自己在一九八二年开设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讲授课程时,为解答广大同学当时所特别关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自己在湖北省一九八二年中国史学年会,以及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和部分教职工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个部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论战,一直是吾师唐长孺先生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曾多次对我讲述过这一问题的内容、源流和实质,而且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特表感谢。